

唐朱昌 / 主编

俄罗斯

经济转轨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透视

记载俄罗斯经济转轨十年来的风雨历程
总结俄罗斯经济变革的经验教训
预测普京新政的发展前景



Eluosi Jingjizhuangui Toushi

唐朱昌●主编

俄罗斯 经济转轨 透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经济转轨透视/唐朱昌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12

ISBN 7-80618-914-9

I. 俄... II. 唐... III.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俄罗斯 IV. .

F15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7883 号

俄罗斯经济转轨透视

主 编: 唐朱昌

责任编辑: 余 同

封面设计: 阿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铁路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开

印 张: 8.125

插 页: 2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ISBN 7-80618-914-9 / F·487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20世纪已经匆匆地过去，但是20世纪的历史给人们留下了永恒的财富。20世纪的俄罗斯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和两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前者是指1917年以前的沙皇俄国时期、1917~1991年的苏联时期和1991年以后的转轨时期；后者是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90年代开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转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俄罗斯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转轨，它不仅使俄罗斯丧失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使昔日超级大国主要继承国的俄罗斯在经济上已沦为世界二、三流国家。整个90年代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以上，其下降幅度超过了俄罗斯国内战争时期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经济下降幅度之总和(44%)，也超过了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美国经济的下降幅度(30%)。1999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5%，而同期美国占世界的21%，北约国家占世界的50%。目前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奥地利的水平，居世界第十二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1999年发表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目前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能力位居世界第47位。

事实证明，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危机是一场囊括经济各领域并与社会、政治领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极其深刻的全面危机。这

场危机带给俄罗斯的决不是像经济转轨设计者原先所预料的那样,是很快能过去的“局部性的短痛”,而是使俄罗斯生产力巨大倒退、综合国力严重削弱的“长痛”。

虽然20世纪最后一年的普京“新政”,给俄罗斯社会经济带来了“一缕春风”,在1999年经济小幅增长的基础上,2000年的经济又出现了7.7%的增长。这是俄罗斯在20世纪最后十年首次出现的连续两年的经济增长。此外,2001年上半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又比2000年同期增长了5.5%。但俄罗斯近几年出现的经济增长更多地来自于“外生性的经济变量”,从目前的情况看,俄罗斯还难以在短期内形成能对经济稳定增长有根本性意义的“内生性经济变量”。俄罗斯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在明后两年有较大幅度回落的可能,而且将面临所谓的“2003年问题”,即那时俄罗斯以前投资的发电站、桥梁、铁路、公路等等的基础设施的运行寿命将达到极限,与此同时,俄罗斯偿还外债的高峰也在2003年来临。如果支撑近两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外生性的经济变量”不复存在,如果没有外资的不断注入,俄罗斯经济“将失去在1998年获得的几乎所有的竞争力”。可见,俄罗斯的经济复兴过程将充斥着变数和矛盾。俄罗斯不可能轻而易举在短期内真正摆脱危机,实现经济复兴。目前俄罗斯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要使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至少需要10年时间。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经济组织方式,就其基本要素、运行机理和运行规律而言,在各国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但其运作过程和结果却没有划一性,它因基本国情、运行模式选择、国家宏观调控水平等因素而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仅仅是转轨方式不同所致?还是其他原因所致?导致俄罗斯经济转轨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正是本书努力要回答的。此外,出现在20世纪最后一年的普京“新政”,它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它包括什么内

容?它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变化?会遇到哪些难题?俄罗斯在新世纪的经济发展前景如何?中俄两国在20世纪后期建立起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中俄两国的经济合作带来了什么变化?在新世纪里还会有什么发展?这也是本书力求努力要回答的问题。

本书涉及的时间跨度虽然只有十几年,然而对俄罗斯来说,却涉及了两个时代,一个是一波三折、动荡不定、风云变幻和急剧变革的叶利钦时代,另一个虽是刚刚开始,然而却是俄罗斯人充满着更多企盼、渴望和追求的普京时代。在论述这两个时代的经济转轨时,作者虽然不免要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脉络给读者以一个简单明确的交代,但是作者不囿于对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作一般的教科书式的论述,而力求从宏观和微观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对政府、地区、企业、居民等这些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在俄罗斯过渡经济中的作用过程进行综合性的分析,透视俄罗斯在过渡战略模式选择、市场机制和国家调控、资本注入机制、经济全球化、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等方面的问题,力求找出俄罗斯过渡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以有利于我们在增加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知识存量的同时,通过比较研究,加强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理解和执行。

2001年7月,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是中俄关系史上的新篇章。《条约》彻底屏弃了那种不是结盟就是对抗的冷战思维,以互信求安全、互利求合作的新型的国家关系准则,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坚定意愿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条约》规定两国将在互利基础上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毋庸置疑,中俄关系将在新世纪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愿本书的出版能为中俄两国的人民进一步了解对方,为中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尽微薄之力。

本书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俄罗斯经济问题教学和研究的教授。本书各章作者为：唐朱昌（前言、第一、二、四、八章及第七章一、二节），李新（第三、五、九章），刘军梅（第六章、第七章第三节）。全书由唐朱昌主编并统稿和定稿。

本书系复旦大学社科规划项目，得到了复旦大学的资助。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帮助，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不少同行的著作和论文，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支持。肖红专同志也为本书的出版尽了大力，在此一并致谢。

书中挂一漏万和谬误之处，祈望指正。

唐朱昌

二〇〇一年七月于复旦园

Eluosi Jingjizhuangui Toushi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痛苦的转轨历程	1
第一节 苏联巨星的陨落	1
第二节 何去何从的选择	12
第三节 盖达尔模式的破产	14
第四节 切尔诺梅尔金和基里延科政府的危机	21
第五节 普里马科夫、斯捷帕申政府和叶利钦本人的辞职 ...	29
第六节 “激进”和“渐进”转轨的孰优孰劣	35
第二章 “两只手”调控的选择	39
第一节 并非万能的市场	39
第二节 “两只手”的作用之争	42
第三节 普里马科夫政府强化国家调控的努力	46
第四节 普京“新政”的宏观调控趋向	51
第三章 俄罗斯国家对地区发展的调节	58
第一节 经济的调节	58
第二节 联邦制的改革	70
第四章 一卖了之的产权“革命”	75
第一节 “治病要治根”:私有化的理论基础	75

第二节	私有化的推行	78
第三节	农业的私有化	85
第四节	私有化的社会经济效果	89
第五章	财税、银行、价格体制的转轨	102
第一节	财税体制的转轨	103
第二节	银行制度的转轨	113
第三节	价格体制的转轨	116
第六章	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会保障机制	119
第一节	收入分配机制	120
第二节	劳动力市场与就业机制	129
第三节	社会保障改革及其难点	134
第七章	对外经济关系的调整 and 变化	149
第一节	对外经济关系实施方略的调整	149
第二节	对外经贸体制的调整	174
第三节	俄罗斯招商引资中的喜与忧	186
第四节	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问题与前景	201
第八章	俄罗斯经济转轨危机的教训	214
第一节	经济转轨危机的表现	214
第二节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教训和启示	222
第九章	进入21世纪的俄罗斯经济	231
第一节	普京继承的俄罗斯遗产	231
第二节	俄罗斯把握未来机遇的方针和政策	234

第一章 痛苦的转轨历程

苏联的解体是震撼20世纪世界的一件大事，为什么这个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世界第一大国，竟不战而溃，其中的原因当然不是单一的。但是，毋庸置疑，传统的体制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因此，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的俄罗斯，抛弃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就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本方法的经济运作系统，在各国和各地区有其同一性，但其运作的过程却因国情的不同而具有多样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根据本国国情，构建有效率、有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是经济转轨国家的一项重大的战略选择。然而，俄罗斯的转轨设计者，置本国国情于不顾，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把“休克疗法”视为拯救俄罗斯的灵丹妙药，结果使经济转轨落入西方模式的“陷阱”难以自拔。转轨历程一波三折，痛苦坎坷。

第一节 苏联巨星的陨落

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高高飘扬了69个春秋的苏联国旗，在天阴地冻的夜色中黯然降下，代之徐徐升起的是由白蓝红三色构成的俄罗斯国旗。苏联的解体，不仅标志着由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复存在，苏联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已像世界历史上经历了兴衰过程的一些帝国一样,已成为历史的代名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苏联曾是一个超级大国,因此它的解体,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此,从战后开始存在了四十多年的两极体系宣告彻底崩溃,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概念开始消失,国际关系格局开始向多极化发展。

为什么曾经战胜了14国武装干涉和德国法西斯残暴入侵的苏联,这一次却不经一枪一炮“哗啦啦似大厦倾”?不可否认,在苏联的解体过程中,外国的政治压力、思想意识、文化渗透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基础。正如1991年12月27日的波兰《论坛报》曾载文所说的那样:“苏联帝国的崩溃,既不是来自外敌入侵,也不是来自外省造反,而是自我灭亡。”

那么导致苏联自我灭亡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传统的经济体制拖垮了苏联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的考察,得出一条结论:社会化的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客观上要求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一些国家取得胜利。然而,与他们的预测不同,社会主义革命却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胜利。由于苏联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为了保障苏联的生存,必须集中国家的所有资源。而对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特征的片面理解,又加快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形成。这种体制对苏联集中使用有限的资源,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保证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苏联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分

工的日趋深化,这种在苏联历史上扮演过“功臣”角色的传统体制,越来越暴露出阻碍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弊端。

第一,政企不分,产权管理主体多元化。传统管理体制把国家作为政权机构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能,和国家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代表行使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没有分开,合二为一。政府设置了为数众多的行政管理部门,却没有建立独立行使所有者职能的管理部门,其结果必然是产权管理主体多元化。为数众多的行政管理部门,都成了国有资产管理的主体。从而造成产权分割,产权关系模糊,责职严重不清,谁都想当“婆婆”,但谁都不承担责任,阻碍了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影响了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

第二,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不分。由于企业不拥有法人财产权,因而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企业成了国家这一架机器上的螺丝钉,从而严重压抑了企业的经营活力。

第三,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传统管理体制把价值、利润、市场、竞争等经济范畴视为资本主义的残余,用高度集中的计划调节,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用行政管理方法,排挤经济管理方法,把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产量和产值,作为衡量企业经济活动的根本尺度。产量和产值成了“硬任务”,成本、利润等效益指标则成了“软任务”。使苏联经济长期在高消耗、低效益和经济结构失衡的“病态”中运行。

第四,重行政、轻经济利益的驱动机制,使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业精神受到极大的限制。干群关系也成了“猫鼠关系”。

第五,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必然在各级的管理机关中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必然出现一批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依靠主观武断“瞎指挥”的管理人员。而大量的“传声筒”式的干部的存在,广大生产者没有主人翁感却有传统体制下形成的惰性,客观上

又为这种体制的推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使传统体制弊端的作用得以充分的展现。而传统体制弊端的作用得到充分展现之际,也是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功能日趋衰竭之时。

总而言之,传统的经济体制严重地压抑了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削弱了国民经济综合体的各种有机联系,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综合协调发展,阻碍了科学技术进步,使苏联经济失去了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是日趋衰竭的传统体制拖垮了苏联。

二、不是改革的“改革”葬送了苏联

针对功能日趋衰竭的传统体制,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苏联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建议和设想。从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开始,历届苏联政府都采取过一些措施,对传统的体制进行“改革”。但由于这些“改革”实际上是对传统体制框架进行的某种修补,因此收效甚微。

曾经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红极一时的戈尔巴乔夫的“根本改革”思路,虽然涉及到了以市场为趋向,使企业成为真正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领导体制等等的内容,但是他实际上仍然不知道如何针对苏联的特点,寻找保证改革成功所需要的经济机制,没有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前提条件和必要的社会环境。“根本改革”基本上处于空转状态。“加速战略”走向了反面。由于对改革的难度估计严重不足,因而在改革遭到重重阻力后,又匆匆忙忙掉转枪口,把“根本改革”的重心转向政治体制,认为苏联经济障碍机制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运行存在缺陷,在于陈旧过时的有时不符合实际的政治理论方针”。企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克服经济改革阻力。但由于把障碍机制的政治根源作用绝对化,片面强调民主化,过多地纠缠历史旧帐,过多地否定历史,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成了“政治化思维”的俘虏,使国内政治形势处于失控状态。“多一些民主”,“多一些公开性”成了

崇拜西方民主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依据。“根本改革”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混战。社会主义的苏联被盲目崇拜西方制度、西方民主的极端势力所葬送。

三、两极体系的压力压跨了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美国孤立主义的历史,也打破了苏联被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的局面。美苏两国作为两种体系,两个力量的极端,在战后的国际战略态势上构成了一种平衡,形成了两极均势的基本框架。从国际关系的均势观点看,两极体系要求苏联和美国必须保持军事力量的大体相当,因为只有保持两国军事力量的大体相当,才能保持两极结构的相对稳定,保持两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一旦力量均势遭到破坏,两极体系就不能维持下去。正是两极体系的这种压力,促使苏美两国为确保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而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唯恐自己被对手超过,影响自身的生存和安全。

从7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每况愈下,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虽然当时苏美经济差距到底是多少,迄今仍然无法肯定,但即使根据苏联官方《国民经济统计年鉴》公布的资料,苏美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仍然可见一斑。198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67%,工业产值相当于美国的80%,农业产值 - 85%,但到1988年,这些指标分别下降为64%、79%和82%左右。而俄罗斯学者对苏美经济差距的估计与官方出入甚大,有的认为,到80年代末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30%,有的认为只及美国水平的14%^①。与此同时,害怕落后,害怕均势被打破,害怕失去超级大国地位的心理,迫使苏联必须在军事生产领域保持与美国大体相当的开支(苏美两国当时都承认两国之间的均势状态)。

^① [俄]《自由思想》,1994年第6期。

长期以来,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苏联的国防开支大约维持在每年200亿卢布的水平上,显然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数据。直到1989年,苏联政府才开始比较完整地公布军费开支的数据(见下表)。

1989 ~ 1991年苏联的国防开支

项 目	1989 财政年度		1990 财政年度		1991 财政年度	
	10 亿卢布	%	10 亿卢布	%	10 亿卢布	%
采购武器和技术装备	32.6	42.2	31	43.7	39.6	40.1
进行科研和试验设计工作	15.3	19.7	13.2	18.6	12.4	12.6
维持军队和舰队	20.2	26.1	19.4	27.3	31	31.4
军事建筑	4.6	6	3.7	5.2	6.2	6.3
支付抚恤金	2.3	3	2.4	3.4	4.1	4.1
其他开支	2.3	3	1.3	1.8	5.2	5.3
总计	77.3	100	71	100	98.6	100

资料来源:[苏]《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1991年第5期。

由于苏联的经济实力远远不及美国,因此维持战略均势必给苏联经济带来的负担比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负担更沉重。1989年苏联的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5%,1990年占7.6%。而同期,美国分别为5.4%和5.9%。1989年,苏联的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31.7%,而美国为26.6%^①。

显然苏联是无法经受两极体系施加给自己的压力,即长期在军事上与美国抗衡,与美国保持均势。因此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被美国拖垮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四、苏共自己拱手让出了苏联

^① [苏]《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1991年第5期。

苏共是执政党,她既是苏联人民利益的代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领导力量,又是确保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转的核心力量。苏联之所以能存在70多年,苏联共产党功不可没。但长期以来,为确保高度集中的国家管理体制的运转,苏共的领导体制也高度集中,党内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官僚主义严重,法制意识薄弱,个人迷信和特权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失误频频。然而,苏共的高层领导人并没有正视苏共党内存在的种种弊端,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改善党的领导。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空喊口号多,给广大人民的实惠少,甚至连老百姓所需要的日常消费品也得不到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任何看不见实惠的改革方案都失去了信心。从1989年底到1990年初,要求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共产党在苏联的法定领导地位,建立多党制,主张“三权分立”,“政治局辞职”,“中央委员会辞职”等等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苏共领导几乎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而是一味退却,表示苏共愿意“放弃某种法律和政治优越地位”,“为自然取得执政党地位而斗争”。

1990年2月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草案,公开表示同意实行“政治多元化”,建立多党制,放弃苏共的“垄断权”,实行“三权分立”。这是个被某些西方报纸称为“列宁在天之灵也要为苏共的变质而哭泣”的纲领,是苏共彻头彻尾的投降纲领。西方国家的政坛要人对苏共的不战而降,自动拱手让出政权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的“了不起的决定”,是值得“欢迎的决定”。

1991年“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更是变本加厉,加快了让出苏联政权的步伐。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停止苏共在苏军队、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组织中的活动。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